

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

朱惠国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	齐森华	1
前 言		1

上编 经学的渗透与传统词学 的最后辉煌

第一章 嘉道间学术的大体走向与词学 的演化		3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衰落与学派的裂变		3
第二节 常州词派产生前的词学演化方向		11
第三节 该时期经学与词学的交叉和部分重合		16
第二章 “常州学派”与“常州词派”的相互关系		20
第一节 常州学派的文学渊源		20
第二节 张惠言与常州学派主要成员及庄氏 家族的关系		27
第三节 常州学派对常州词派的影响		35
第三章 张惠言的理论贡献与常州词派的形成		42
第一节 张惠言的词学理论		42
第二节 “常州词派”的意义与评价		58



第四章 常州词派初创时期的词学思想	64
第一节 董士锡对张惠言词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64
第二节 宋翔凤的经学和词学	76
第三节 周济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84
第五章 常州词派成熟时期的词学思想	109
第一节 谭献对常州词派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110
第二节 陈廷焯对常州词派的贡献	133
第三节 这一时期其他词学家的理论贡献	157
第六章 “常”、“浙”两派的融合与传统词学的 终结	180
第一节 “常”、“浙”理论的共源性	180
第二节 “常”、“浙”互补的现实性	185
第三节 以“常”为主,融合“浙”派	196
第四节 传统词学的终结	204

下编 中西文化冲突与现代 词学的确立

第七章 梁启超的词学思想及其在词学 现代化转换中的作用	209
第一节 梁启超与他的词学研究	210
第二节 梁启超词论的基本内容	214
第三节 梁启超词学思想对建立现代词学 的意义和贡献	225
第八章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及其在词学 现代化转换中的作用	229

第一节	王国维的“境界”说	229
第二节	与“境界”相关的几个概念	239
第三节	王国维对词学现代化转换的意义	246
第九章	传统词学的余波与回响	251
第一节	况周颐与《蕙风词话》	252
第二节	郑文焯及其词学观	268
第十章	“新文化”思潮与词学的重新整合	275
第一节	“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275
第二节	词学研究格局的重新整合与词学家 的三种走向	281
第三节	胡适的词学观及其评价	284
第十一章	词学传播媒介的变化与现代 词学的确立	312
第一节	现代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	312
第二节	专业性词学刊物的出现与词学的繁荣	317
第三节	其他词学传播媒介	326
第四节	现代词学传播媒介对词学家的影响	336
第十二章	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对现代词学 的贡献	340
第一节	龙榆生对现代词学的贡献	340
第二节	夏承焘对现代词学的贡献	347
第三节	唐圭璋对现代词学的贡献	352
结 语		369
附录一：	《词学季刊》所刊文、图一览表	370



附录二：《同声月刊》所刊主要词学论著一览表	389
主要参考文献	399
后 记	405

序

齐森华

惠国同志从事词学研究多年,学术上多有建树。近年来协助马兴荣教授编辑《词学》集刊,工作亦颇为尽责。世纪之初,为了学术更上层楼,他又以不惑之年,克服了诸多实际困难,在职攻读博士学位,重点研究中国词学理论。这部《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便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初稿完成后,曾有幸得到校内外多位同行专家的不吝赐教,并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和他相识已近二十年,谊兼师友,自然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承他不弃,执意要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我自知才疏学浅,岂敢言序,但又盛情难却,只能把初读他的论著的点滴感想写出来,以求教于各位专家与读者。

《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的一个突出长处,是能以古今贯通的学术视野,打破文学史研究中长期形成的古代、近代、现代、人为割裂的格局,把近世词学思想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全面的梳理与论述。阐述中作者又能牢牢抓住近世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这一发展的主线,探索了转换的文化动因,揭示了转换的主要标志,并且别具匠心的选择了从张惠言到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九位词学大家,作为二百年来词学发展的里程

碑,充分展示了近世词学思想转换的历史轨迹。全书观点与材料密切结合,宏观与微观相济为用,可谓纲举目张,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这样的研究,既使我们对近二百年的词学发展具有一以贯之的整体性认识,又使现代词学这一块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历来两不管的研究盲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关注。这对于中国词学思想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新的开拓。当然,关于文学史的古今贯通问题,并不是惠国同志的首创。近年来,经过不少有识之士的倡导,似乎已成为研究文学史的一种共识。但我以为以往更多地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更重要的是进行古今文学贯通研究的实践。只有通过大量的成功实践,才能逐步突破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以形成新的更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研究格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惠国同志对中国近世词学思想发展所作的整体性研究,尽管还只是初步的探索,但对于改进并深化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作为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近世词学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新旧并存,中西汇合。惠国同志的论著充分注意到了这种特点,能用比较通达的多元并存、多元互补的学术眼光,来全面评价各种不同倾向的词学家以及他们的词学思想。比如,常州词派在晚清词坛固然独领风骚,但作者并没有把晚清词学视为常州派的一统天下。论著在充分肯定常州词派主潮地位的同时,同样以十分翔实的史料,展示了浙西词派在晚清词学发展中的深远影响。而且还有更多既非常派,又非浙派所能概括的词学家,他们或兼采浙常,或自出机杼,也都有他们独到的贡献。尽管各派词学,各有主张,各有特色,各具风貌,但他们又都活跃于同一词坛,多元并存,多元竞争,多元互补,共同构成了晚清词坛丰富多彩的历史原生态。惠国同志的论著,对于晚清词坛这种多元化与复杂性的描述,应当说是比较充分的。又比如,“五四”以后,伴随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现代词学得到蓬勃发展,已明显成为时代的主流。但现代词坛并非一花独放,仍然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格局。论著以精辟独到的分析,阐述了“五四”以后词学思想发展的三大走势。那些固守传统的旧派词学家,并没有因文学的“革命”而消失词坛,有时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活跃,尽管已成为支流,但仍取得了可观成就。梁启超、王国维一类新型词学家,或新旧交融,或中西合璧,则为词坛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空气,有力地推动着传统词学思想向现代的转换。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代表的现代词学家,更是顺应时代潮流,熔铸传统学术,创建现代词学,成为现代词学发展的主潮。三类词家,尽管倾向有别,主张各异,但他们都在现代词坛多元并存,共同为现代词学的建构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惠国同志的论著,对于现代词坛的基本格局的论析,也是比较准确的。

文学中的多元并存,既是一种永恒的现象,又从来不会是一种静止的存在。各种流派,各种倾向,各种思潮,各种文类,它们一方面相互矛盾、对立、竞争,另一方面又总是互相吸收、融合、互补。惠国同志的论著,在分析近世词学流派、词学思想此消彼长的历史过程中,自觉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没有采用以往那种只讲对立,不讲融合的简单化、绝对化做法,这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就以常州词派与浙西词派来说,这是清代词坛两个各有理论主张,都有大批词家追随的重要词学流派。它们之间理论上的对峙与竞争,不仅延续时间长,而且影响也十分深远。我们以往的研究,总是比较多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本书却独具只眼,能用较大的篇幅充分揭示浙常两派在词学理论上的互补和融合。既深入分析了常州词派与浙西词派理论上的共源性,又充分阐述了两派词学家互补的现实性,并从剖析两个词学流派各自的理论缺陷,以及两派词家为完善自身理论



而作的努力入手,揭示了融合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历史必然。最后还列举代表作家,具体论析了两派融合的三种类型。作者视野较为开阔,立论也颇为新颖,既注重实证,又富于思辨,把清代词坛这两大词学流派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错综复杂关系,勾勒得较为全面、也颇为清晰。

学术创新,可能是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中的共同追求。无论是选题的新颖,还是理论的创新,或是新方法的运用,对于学术创新而言,自然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以为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拓宽我们的学术视野,似乎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惠国同志的论著,正是比较好的运用了古今贯通、多元并存、对立融合的思维方式,来从事近世词学思想的研究,从而使自己的学术观念与学术眼光有所更新、有所突破,并初步取得了一点成效,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以某种启示。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日

前言

(一)

自十八世纪中叶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二百年间,词的创作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状态,如果将张惠言时期的词作与龙榆生时期甚至再晚一些时间的词作相比,在用词、句法、表现手法乃至思想内容上变化都不很大,但这期间对词的研究、对词籍的整理、对词家词派的探索以及对历代词论、词评的重新评价等一系列工作,即通常所说的词学,却在学术观念、视角和研究手段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其标志为:直观看,现代词学研究成果表现为专著与系统的文章,而张惠言、周济时代的传统词学则以选本、点评、序跋、词话为主体;深一层看,现代词学研究以西学现代文艺学为理论基础,以现代科学方法为手段;而传统词学则基本局限于旧的思想意识,以个人感受加理性思索为主要研究手段。

研究这种转换的动因和过程,梳理词学质变的基本轨迹,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把握这一时期的词学思想,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考察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手段和学术思想在生存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又

可总结出一些中西方文化冲突中,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变的经验与教训。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遗憾的是,迄今少有学者在此领域开拓。究其原因,大致受如下两方面的局限:其一,由于习惯上以“五四”为界,将中国文学史划分为近代和现代两部分,因此传统的词学研究一般到王国维结束,而现代文学研究又往往将词学归入传统文学范畴而不加关注,因此二三十年代的词学几乎成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盲点。其二,以往的词学研究一般对单个词学家研究较多,对词学家之间的联系关注较少,也即点状的研究多,线状的研究少,不利于对中国词学思想发展演化方向作宏观的研究和把握。有鉴于此,我们力图在这两方面有所突破:打通近、现代的隔阂,抓住“转换”这一主线,努力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出新,以形成自己的特色。

(二)

我们所指的近世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从时间上说,大体相当于十八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词学研究的人物活动来看,大体从张惠言到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三大家。提这样一个时间概念,主要是考虑到文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会因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在某一时间节点截然发生质变。事实上,晚清重要词家及词学家中的一些人,如朱彊村等的词学活动一直持续到三十年代初期,故我们的研究也应跨越一般文学史上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点,以保持其完整性与连贯性。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将从张惠言到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时期的重要词学家和词学思想作一梳理,找出这一阶段词学思想

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轨迹,进而探索近世词学思想演化的规律。具体从纵横两方面着手:横向,主要是研究不同时期词学家的词学思想,进而探寻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对词学家的影响;纵向,主要是研究不同时期词学家及其词学思想的前后承继与发展关系,进而发现其演化规律。其间以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为代表的常州派词学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词学思想,胡适的词学思想,以及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等新型词学家的词学思想为研究重点。另外,近世两次重大社会形态变化对词学思想的影响也作重点考察:一是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对中国传统词学思想的实际影响,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词学思想的冲击。

我们的工作按操作顺序大致可分两个阶段:材料收集、整理阶段和研究、写作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努力还原这一时期词学及词学环境的原生态,主要对当时的词论、词评进行发掘、整理,对词学家的活动加以考证,并尽量对所留存的词作进行发掘、考辨、梳理。第二阶段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所揭示的一般思维规律,寻找和把握词学观念演化的内在联系,努力完成从现象到本质、个别到一般的概括,探寻词学思想的内在发展规律;其次是将词学思想发展演化过程放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后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文化背景,以及“五四”后新文化对传统文化形成重大冲击的社会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三)

我们认为,词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是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其间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首先是传统词学的辉煌期。这时期以张惠言、周济、谭献、陈廷焯为代表的常州派词论家创建了一套中国词学史上最为严密又相对系统的词学理论。这是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同时又为现代词学的产生作了准备。这时期乾嘉学派的烦琐学风开始暴露弊端，宋学被重新提起，以后形成推重“经世致用”的思潮。常州派产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同时其创始人与主要成员又与经学关系密切，而如张惠言、宋翔凤等，本身就是著名的经学大家。这时的词学受经学影响极大。其次是传统词学的蜕变和现代词学的确立期。王国维、梁启超的词学观是传统词学的延续，但已开始蜕变，更多地融入了时代色彩，表现出中西文化既冲突又互补的一面。两人的词学研究表现出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基本特征。梁启超的词学观基本是一种社会批评的方法，这与传统的诗教有关，与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学者三位一体的特殊身份有关，也与当时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倾向有关。在词学研究方法上，他推崇培根，强调实证，将传统的方法引导到科学的路上。王国维的词学研究既继承传统，如采用词话的形式，不强调系统等，却又明显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影响。他是中国词学由传统到现代转换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五四”新文化思潮使中国文坛发生质变。尽管词的创作固守着传统，但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发生了变化，词学家呈现出三种基本走向：其一是传统的词学家。他们孜孜不倦地研究着词的创作规律，硕果累累，影响也很大，但遗憾的是没有走出传统词学，难以承担起创立现代词学的重任；其二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词学家。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不算是纯粹的词学家，如胡适，只能讲是以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甚至政治家的身份来兼而研究词，发表一点意见。但由于他们的身份和影响力，加上过人的才气，往往使其观点有独到之

处。他们为词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为现代词学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是以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为代表的现代词学家,既继承了传统,具备相当扎实的词学功底,却又不拘泥于传统,拥有不断接受新观念、创造新事物的欲望和能力。如龙榆生,是老一辈词家朱祖谋的衣钵传承人,同时又是现代词学传播媒体的创始人和主持人;既能熟练运用传统词学的考证方法和点评方法,又能以现代的分析方法和实证方法来研究词。他们是带着传统词学精华冲出旧的营垒去创建新阵地的新一代词家,最终确立了中国现代词学。

从张惠言到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亦大体勾画出了中国词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过程的粗略轨迹。

上编 经学的渗透与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

清代为词的中兴时期,这包括创作与词学研究两方面。时间上,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期以创作的繁荣为主要特征,辅以理论倡导,产生了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一批杰出的词人,以及浙西、阳羨等影响较大的词派。使词经历了元、明两朝的沉寂之后,骤然放出异彩,令人眼前一亮。后期词的创作不如前期繁荣,但词学研究却特别发达。以张惠言、周济、谭献为代表的常州派词论家创建的词学理论,使词学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常州词派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既是词学本身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又与乾嘉以后经学的裂变、重组相关。初创时期的常州词派在词学观点、研究方法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常州学派的影响,词派的创始人与主要成员中,如张惠言、宋翔凤等本身就是著名的经学大家。常州词派的理论不自觉中受到了经学的影响,深深地烙上了本时期经学的印记。

第一章 嘉道间学术的大体走向与词学的演化

乾嘉时期,崇尚考据的汉学达到顶峰,但其过分屑屑于一字一句烦琐考证,以考证代替经义阐释的不良学风日益显现出其固有的弊端。加之乾嘉以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康乾盛世不再,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出现并加剧,乾嘉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正在消失。在学派本身和社会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乾嘉汉学面临着学派的分裂和重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潮正在酝酿。另一方面,清代的词坛在经历了浙西派的兴起、繁盛与逐渐衰弱之后,也正需要有一种新的词学思想和词学流派产生。这种情况下,一个以研究今文经学为特征,重“经世致用”,又与词学、散文关系密切的新学派——常州学派产生了。常州词派随之而生,并迅速发展,成为道咸以后的主流词学。

第一节 乾嘉汉学的衰落与学派的裂变

皮锡瑞认为清代学术有三变:

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



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是为西汉今文之学。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①

皮锡瑞是今文经学家,其观点不免偏于今文经学一派,但其将学术发展、演化的过程归为三变,则大体理清了清代学术发展、演化的基本线索。

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发展、演化的历史时也有类似说法: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②

梁启超和皮锡瑞都是清末时人,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尚有可探讨之处(尤其是皮氏),但他们在清代行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对清代的学术之流变作了全景式的回顾,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如果将张惠言开创的常州词派对应到清代学术流变过程中,那么,其时间大概是处于崇尚汉(东汉)唐的乾嘉汉学向崇尚西汉的今文经学的转变时期,也即两人所说的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时期。

这一时期的起点是乾嘉汉学全面繁荣,处于日丽中天的巅峰状态。当时学者几乎没有不受其影响的,所谓“人人许郑,家家贾马”。最能代表汉学成就的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吴皖两派都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扎扎实实地研究古经及注疏,力求恢复《六经》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万有文库本)P353,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P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